

Summer 2018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June No.41

2018年6月 第四十一期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41 期
2018 年 6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655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编委会顾问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 勇 清华大学校长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 伟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彭 龙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潘一山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吴朝晖 浙江大学校长
Phung Xuan Nha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t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Regsuren Bat-Erdene 蒙古国立大学校长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李 越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田德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朴灿奎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kh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Kyaw Nai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azartseren Boldgiv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CONTENTS

目录



P.02

→ 2018年5月4日下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指导，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



P.07

→ 2018年5月26日，“上海论坛2018”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

特稿

- 02 “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举行
- 07 “上海论坛”2018年会举行
- 10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2018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举行

学术活动

- 11 “亚洲大学崛起”教育圆桌会议举行
- 13 第三届中国—东盟青年论坛举行
- 1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巴尔干地区合作研讨会举行
- 16 “全球史与中国2018”系列学术讲座第一至第十讲举行

研究进展

- 28 革命与爱情：萨尔都戏剧在中国（1907—1946）



“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举行

2018年5月4日下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指导，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本次研讨会以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为契机，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高校代

表出席，包括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海内外知名大学校长及世界知名学者，近800人齐聚

一堂，以“变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为题，携手共议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与世界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向。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校长林建华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林建华主持。

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恰逢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更具特别意义。120年前，作为中国首个国立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伟大起步。120年后，北大41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成为入选学科数最多的高校，继续发挥中国高等教育“排头兵”的作用，在新时代迈上新征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文明多元化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变与不变”成为了120年来世界大学和文明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次研讨会以此为题，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校长与著名学者，聚焦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议题，展开学术交流，共同探寻大学与世界文明携手并进的新路径。

孙春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她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对大学办学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就是要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坚持特色办学、协调发展，坚持面向世界、融通中外，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提升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更好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更好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

孙春兰强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的大势，大学应进一步发挥优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她希望中外高校深化务实合作，密切师生交流互访，联合培养更多具备全球视野、担负社会责任、秉持科学精神的优秀人才，携手创造更多引领未来、造福世界的科研成果，共同提高高等教育治理水平，搭建深化人文交流、促进多样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纽带。

开幕式前，孙春兰还专门会见了牛津大学校长路易斯·理查森（Louise Richardson）、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维克多·萨多夫尼奇（Viktor Sadovnichy）等23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陈宝生、郝平、林建华等陪同会见。

陈吉宁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北京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表示问候和祝愿，诚邀各地人才来京发展。

维克多·萨多夫尼奇（Viktor Sadovnichy）表示，北京大学在中俄教育交流历史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期待北京大学为世界高等教育交流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英国剑桥大学校长斯蒂芬·杜思齐（Stephen Toope）分享了自己对于高等教育“变与不变”的体会与思考，提出大学应该开放办学、注重协作，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创新之间谋求平衡。

韩国SK集团全球董事长、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理事长崔泰源表示，实现企业社会价值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未来应该加强企业与大学的合作，培育更多创造社会效益的人才。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主持主旨报告环节。

主旨发言开始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致辞。古特雷斯热烈祝贺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并非常赞赏“双一流”建设国际



孙春兰



陈吉宁



林建华



Viktor Sadovnichy



Stephen Toope



崔泰源

研讨会及国际学术界对联合国工作的推进。他表示，人类世界适逢非凡的发展机遇，谋求共同进步，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古特雷斯希望与大家一同努力，实现全人类共享的和平与繁荣。

林建华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中国大学”的主旨发言，以北京大学为例介绍中国大学、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的巨大变化及北京大学学术队伍的变化，讲解中国的“双一流”计划。他还结合中国大学面临的时代挑战，阐述了北京大学的守正创新、教育改革、发展道路和不懈追求。

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季默（Robert

Zimmer）发表题为“持久的价值观与伙伴关系：大学的延续与变革”的主旨发言，讨论世界领先大学的持久价值观、这些价值如何随着时间推移以新的方式得以实现，以及芝加哥大学与北京大学的伙伴关系。

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五神真（Gonokami Makoto）发表题为“大学在‘变革时代’下的角色”的主旨发言，提出“社会 5.0”的未来设想，阐述“科学、社会与经济”协同与创新的理念。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发表题为“变化与常态：过去 120 年的大学与文明”的主旨发言，通过对比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讲述过去与现在中英大学高等



王博



Robert Zimmer



五神真



Jessica Rawson



朴仁国

教育变迁，讨论所有研究型大学的环境变化、雄心与成就，以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高校的国际合作。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设置了三个主题板块，分别为“文明的生态”“全球治理”和“大学的使命”。每个板块下各设三场平行分论坛，与会校长与学者们就九个分论坛的主题内涵，展开深入讨论。

5月5日下午，北京论坛（2018）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落下帷幕。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来自世界各地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高校的校长和学者以及领导嘉宾相聚一堂，依托北京论坛（2018）的学术平台，围绕“变

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这一主题，共同聚焦新时代的文明生态、全球治理、大学使命等多重话题，探索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携手并进的新路径，碰撞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产生了诸多思想的共鸣。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刘宇辉等嘉宾和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们出席闭幕式。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主持闭幕式。

林建华校长首先致辞。他表示，我们要在培养人才、科研还有治理体系，还有师生交流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我们是敞开大门，希望全球的各个高校能够和中国的大学能够进



一步的合作。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的确是需要我们共同合作才能够真正解决，无论是在学术上、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上，以及各个国家面临的各种文化意识各方面的问题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合作。所以非常高兴北大 120 周年的校庆能够把大家聚在一起，希望本次会议能够更进一步加强合作，把我们的高等教育办的更好。

朴仁国总长表示，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开放得以盛行，学术交流得以繁荣地开展，那么文明就会到达顶峰。文明的顶峰得以实现都是因为互相的交流，并且能够去容忍不同的思维方式，不怀成见的敞开心胸。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借助北京论坛能够开展更多交流的原因。我们每年的演讲数量达到 350 个，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们也可以利用数据库，利用大数据，驱动这些数据进行一些研究。像北京论坛这样的一些数据库

将为我们进一步地推动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刘宇辉主任表示，今日北京正在积极打造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着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迈进。我们将牢牢把握北京城市定位，加快推进教育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与首都城市地位相匹配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为此，我们非常需要像北京论坛这样的高端学术交流平台，汇聚国际各领域专家学者，为北京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城市创新发展出谋划策。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上海论坛”2018年会举行

2018年5月26日，“上海论坛2018”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许涛、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韩国SK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焦扬主持。来自全球各地智库、

高校、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嘉宾和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论坛。

开幕式后，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赫塔尔（Shamshad Akhtar），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河村建夫，巴西财政部前部长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埃里森 (Graham Tillet Allison, Jr.),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新奎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此次论坛主题, 嘉宾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了主旨演讲。

本次论坛分为“全球治理”“生态治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和“文化文明”六个板块, 共有 13 场圆桌会议, 14 场子论坛, 议题涉及大国关系、“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绿色治理、绿色金融创新、数字健康、老龄化应对、极地开发与治理等亚洲乃至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与会代表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 以专业的视角就以上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力求集政、商、学界之大成, 从多角度、全方位来探寻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新使命。

今年, 上海论坛继续致力于打造全球智库汇聚平台。在向全球开放圆桌和子论坛承办工作的机制下, 上海论坛接到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逾 70 家高校、智库、企业、媒体等机构的申请, 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印度、以色列、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土耳其等国。令人瞩目的是,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拉脱维亚国际关系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众多高校及智库机构申请并参与办会, 使得国际化和多元化的上海论坛进一步成为国际智库与智者思想交流与碰撞的舞台。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成为当务之急, 论坛组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将论坛大主题由沿用了 12 年的“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调整为“全球治理与亚洲”, 期待亚洲能够在全

治理这一更宏大的格局中提供资源与智慧。

5 月 28 日, 为期三天的“上海论坛 2018”年会在复旦大学闭幕。闭幕式上, 各高端圆桌就会议举行情况和主要结论进行了专题汇报。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先后在闭幕式上致辞。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主持闭幕式。

本次论坛年会, 共有近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和媒体代表齐聚复旦, 围绕“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这一主题, 共同找寻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新使命。通过各方承办的子论坛研讨、圆桌会议、高端对话等多元形式, 论坛分享了北美、北欧、中欧、中亚、东盟、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地的经验, 探讨了大国关系、“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绿色治理、绿色金融创新、数字健康、老龄化应对、极地开发与治理等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 为上海、中国和亚洲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 亚洲如何能够在全球治理这一更宏大的格局中贡献资源与智慧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论坛认为,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组, 现行碎片化和低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 新的趋势和变化正在不断发生扩散。亚洲需要巩固团结合作, 携手应对挑战。亚洲地域广阔, 文化多元, 各国政治制度各不相同, 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面对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挑战, 整个亚洲地区更需要紧密团结在一起, 协同融合, 深化政治互信, 加大相互支持, 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亚洲需要坚持开放包容, 深化务实合作。亚洲地区经济增长迅速,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 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当下, 亚洲地区应该继续推进区域合作制度, 抓住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机遇, 通过国



家之间的对话协商，努力实现贸易、资金和基础设施三方面的互联互通，建设开放式经济合作关系，带动区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闭幕式举行前，论坛组委会专门组织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脑科学与机器学习：敢问路在何方？（Brain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What Next?）”的高端对话，邀请了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017“大脑奖”获得者彼得·达扬（Peter Dayan），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系计算神经科学教授李兆平，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小i机器人创始人兼CEO朱频频，就相关领域的科学前沿话题展开交流对话和思想碰撞，并就瓶颈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本场高端对话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主持。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界和媒体

代表400余人出席了闭幕当天的相关活动。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宣布上海论坛2018圆满落幕，并再次感谢全世界嘉宾的参与和志愿者的贡献。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大型学术论坛，旨在搭建中外政商学界人士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为区域发展及国家大计建言献策。自2005年创办以来，出席论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近4000人次。论坛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以求更好地为人类进步、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服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论坛品牌，也为上海打响“四大品牌”汇聚来自全球的智慧。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2018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举行



2018 年 4 月 24 日，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召开 2018 年科研项目资助立项评审会议，审议并评定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2018 年科研资助立项项目。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车琳、郭棲庆、黄玫、李莉文、梁燕、林建华、孙晓萌、魏崇新、徐滔、张朝意、张剑、张西平等 12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张西平主持。

会上，张西平教授回顾了中心十年来的科研资助项目总体情况，中心副主任郭棲庆教授汇报了 2017 年科研资助项目结项情况；介绍了 2018 年科研项目资助申报情况及评审注意事项；通报了 2018 年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立项评审结果。

2017 年，中心共收到课题研究、信息汇总项目等 16 个项目提交的研究成果 20 种，其中

CSSCI 论文 4 篇、核心刊论文 1 篇、一般论文 12 篇、信息汇编 2 份、著作书稿 1 份。

2017 年，中心共资助出版学术著作 6 部：《隐喻与思维：汉日英三语中的概念隐喻研究》《教之以廉——基于国内外比较的教育廉政文化研究》《日本“中国文化研究会”研究》《瑜伽文化小史》《〈先祖阔尔库特书〉研究》和《神猴：印度“哈奴曼”和中国“孙悟空”的故事在泰国的传播》。

本年度中心共收到各类项目资助申请 19 项，其中：课题研究申报 12 项、学术著作资助出版申报 2 项、信息汇总项目申报 1 项、学术会议申报 4 项。经过与会委员的认真审阅与审议，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最终评定出本年度中心拟资助立项的 18 个项目，其中课题研究 12 项、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2 项、信息汇总项目资助 1 项、学术会议资助 3 项。项目选题涵盖了外交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翻译学、历史学、区域研究、传播学、国际问题研究、外国文学等 11 个学科领域。学校亚非学院、英语学院、阿拉伯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专用英语学院、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全球史研究院、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文学院、日语系等多个学院、系部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参与了本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亚洲大学崛起”教育圆桌会议举行

2018年4月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本次年会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超过2000位嘉宾出席。

4月10日下午，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官方活动的“亚洲大学崛起”教育圆桌会议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全部来自于亚洲大学联盟创始成员高校。清华大学校长、亚洲大学联盟创始主席邱勇，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亚洲大学联盟2018—2019年执行主席穆罕默德·阿尼斯（Muhammad Anis）、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TAN Eng Chye）、首尔国立大学校长成乐寅（SUNG Nak-in）、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班迪·厄阿鹏（Bundhit Eua-arporn）、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校长迪旺·柯克尔（Devang Khakhar）、马来亚大学校长阿卜杜拉·拉欣·哈欣（Abdul Rahim Hashim）、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校长拉克什曼·迪萨纳亚克（Lakshman Dissanayake）、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校长胜茂夫（Shigeo Katsu）、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林文怡、沙特国王大学副校长阿卜杜拉·阿勒·萨勒曼（Abdullah Alsalman）、缅甸仰光大学副校长翁玛觉（Omar Kyaw）等12位嘉宾

围绕“亚洲大学的责任与使命”“亚洲大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创新与技术转移”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共绘亚洲高等教育的美好蓝图。

邱勇在会议中指出，在全球快速变革的时代，亚洲大学在三个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亚洲大学可以推动亚洲的创新。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拥有约占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未来亚洲国家将更加重视经济增长质量，而经济增长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能力。亚洲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产出引领世界科技变革的创新成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大有可为。第二，亚洲大学在促进全球高等教育的交流合作方面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随着亚洲大学的崛起，亚洲大学之间的合作，以及亚洲大学和其他地区大学的合作变得愈发重要。去年，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了亚洲大学联盟，该联盟包括15所创始成员大学。亚洲大学联盟将致力于促进亚洲大学之间以及亚洲大学与世界各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第一份亚洲大学联盟高等教育年度报告将于今年7月发布，力争使亚洲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三，亚洲大学可以为全球高等教育提供独特的教育理念。众所周知，

世界的发展根植于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也为世界提供了多种选项。亚洲悠久的历史孕育了丰富的文明与教育理念。世界高等教育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大学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模式。通过交流与合作，全球高等教育一定能从亚洲大学的理念中获益。

针对亚洲大学的责任与使命，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指出，终身学习是未来教育的必然趋势，大学必须要改变自身才能够适应这一新的形势。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林文怡认为，教育创新是大学的责任所在，而重中之重是让学生习得学习的能力。

谈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印度理工大学孟买分校校长迪旺·柯克尔认为亚洲国家普遍人口基数较大，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班迪·厄阿鹏认为，大学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积极应对社会需求，尤其是面向未来的需求，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支持未来的社会需求是大学应该发挥的作用。

与会嘉宾还讨论了文化在亚洲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马来亚大学校长阿卜杜拉·拉欣·哈欣认为，亚洲的多元文化是天然的教育资源，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印度尼西亚大学校长穆罕默德·阿尼斯指出，创新一方

面需要以科学为基础，另一方面也需要人类学和社会学专家加入。

在谈到科技成果转化时，邱勇介绍了清华科技园的案例，他认为科技园可以将校园与社会联接起来，有利于大学从政府得到帮助，也有利于高校通过提供技术支持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随后，结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的内容，与会嘉宾就“开放理念在亚洲高等教育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议题进行了交流。邱勇表示，对于大学而言，21世纪高等教育的最重要特征也正是开放。为此，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了亚洲大学联盟，以促进亚洲及全球高等教育的开放式发展。只有坚持开放办学才能持续提升亚洲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亚洲大学崛起”教育圆桌会议结束前，邱勇还就清华大学全球战略的布局 and 主要进展回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第三届中国—东盟青年论坛举行

2018年4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东盟中心主办、山东大学承办的第三届中国—东盟青年论坛在山东大学举行。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杨秀萍，国家留学基金委副秘书长王胜刚，山东省外事侨务办公室一级巡视员李荣，山东省教育厅总督学孟庆旭，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大学副校长程林等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程林在致辞中表示，东盟各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重要伙伴国，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经济、贸易、文化、科技、教育及地缘政治等方面互动频繁，成果显著。程林介绍了山东大学在推动“中国制造2025”、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的探索。他表示，山东大学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与30多个国家的170多所高校保持着友好合作；参与了多个中国—东盟合作项目，为区域性合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东盟国家是山东大学重要的留学生生源国家，越来越多的山东大学东盟校友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交流的友好使者。希望青年学生通过讨论，能更深刻地理解科技与创新的魅力，为未来参与社会，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加强中国—东盟合作和促进东亚区域发展做好准备。杨秀萍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与东盟合作情况。她表示，当前中国和东盟都进入了新时代，正致力于打造更高水平的东盟共同体。教育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部分。未来3年，中国计划向东盟国家提供不少于2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未来5年内将安排500名东盟青年科学家赴华从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训1200人次东盟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投入运行10家联合实验室。

开幕式上，王胜刚、李荣、孟庆旭、浪潮集团副总裁刘伟华，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

越南、菲律宾等驻华使馆官员，东盟及中国学生代表等分别致辞。来自泰国法政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18所国内外高校的师生300余人参加了论坛。

本次论坛主题为“科技与创新”，旨在探讨科技创新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增强中国—东盟青年社会意识和领导力，服务中国—东盟未来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学生搭建交流平台；希望青年能胸怀天下，为促进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在主旨发言环节，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王玉主、浪潮集团副总裁刘伟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董豫教授等分别以“创新合作、深化中国—东盟关系”“科技与创新引领浪潮全球化发展”“历史、科技、合作与未来——从科技考古的视角看科技与创新”为主题进行了演讲。24日下午，论坛举行分议题发言。来自东盟十国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二十多人，围绕“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区域合作”“创新与生活品质”等三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山东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国际大学生iCAN创新创业大赛执行副主席邢建平做了总结发言和点评。

2018年是中国—东盟创新年，以创新促发展是中国和东盟共同追求的重要目标。中国—东盟中心是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成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2011年11月18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及东盟秘书长共同为中心揭牌。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巴尔干地区合作研讨会举行

2018年5月30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巴尔干地区合作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由北外巴尔干研究中心主办。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希腊、马其顿等巴尔干国家的驻华大使、使馆代办以及其他使馆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彭龙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开幕式由巴尔干研究中心主任柯静主持。

彭龙表示，中国与巴尔干地区拥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巴尔干

国家积极响应，与中国在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希望此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世界范围内的巴尔干问题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希望北外巴尔干研究中心积极发挥北外在语言、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的优势，对巴尔干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成为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巴尔干研究中心。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 Selim Belortaja、保加利亚驻华大使 Grigor Kalinov Porozhanov、克罗地亚驻华大使 Nebojša Koharović 先后致辞，



他们高度评价了北外在中国与巴尔干国家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巴尔干地区合作的重大机遇与深远意义，并对北外巴尔干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厚望与支持。

随后，彭龙代表北外向巴尔干中心特聘的10位中外巴尔干问题知名专家颁发了特聘研究员聘书，感谢他们积极参与巴尔干中心的科研工作，支持中心发展建设。

研讨会上，来自阿尔巴尼亚科学院、发罗拉大学、巴尼亚卢卡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卢布尔雅那大学、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希伯来大学、索非亚大学、塞尔维亚《Pečat》周刊、马其顿共和国斯科普里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心、北京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多名巴尔干问题专家学者就各自的研究领域作主题发言，围绕巴尔干地区身份认同、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政治发展与走向，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巴尔干合作三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6月1日，研讨会系列活动青年学者工作

坊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行政楼举行。国内外研究巴尔干问题的知名专家与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宁波市政府办公厅政研处等单位的十多名青年学者、教师就巴尔干研究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方法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分享了各自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学术思考。

北外巴尔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旨在搭建开放式巴尔干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平台，培养高素质专门人才，促进对巴尔干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深化我国与巴尔干地区政治、经济 and 人文交流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面向未来，中心将发挥北外语种齐全、教学底蕴深厚、对外交流广泛等优势，依托学校特色资源，与国内外巴尔干研究专家、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密切合作，围绕巴尔干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巴尔干合作问题等开展深入研究，逐步建设成为我国乃至国际上巴尔干研究领域的重要智库。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摘编

“全球史与中国 2018”系列学术讲座 第一至第十讲举行

2018年3月至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图书馆共同主办了以“全球史与中国 2018”为主题的系列学术讲座，邀请德国哥廷根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汉学系主任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马龙（Manuel Perez Garcia）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扬宗教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副主任陈时龙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经典与解释》辑刊主编娄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陈怀宇，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教授克劳斯·拉瑞斯（Klaus Larres），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印度中心负责人英德拉·森古普塔（Indra Sengupta），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朴宰雨（Park Jae Woo）做了十场学术演讲。

第一讲：何为现代？何为保守？

3月22日下午，德国哥廷根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汉学系主任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在北外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何为现代？何为保守？”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历史学院顾杭副教授主持。施耐德教授是德国波



鸿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荷兰莱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中国史、思想史、科学史、政治学。

施耐德教授提出，保守主义是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经常由于意识形态因素而被扭曲理解。要理解何为保守主义，就要理解它所反对的是什么，亦即要理解何为现代性。施耐德教授对现代性理论中的非文化性理论和文化性理论等分别予以解释，并进一步介绍了现代性的历史渊源、全球传播的过程。他认为，现代性的真正核心在于四个方面：对象化、进步的概念、自我授权和戏剧性。对象化指人与世界已经成为人类主体的对象。进步的概念不仅仅是指改进，而且指不断地加速、效率的提高，

以及全新的时间观念。自我授权指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依据人类的尺度来进行评判。戏剧性指人类行为的自然性逐渐消失，拥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这几个现代性的核心问题适用于全球，也正是全球各国的保守主义所反对的。那么何为保守？施耐德教授提出，保守主义所怀疑、反驳的是人的理性的普遍性与可靠性，保守主义大致可分为两个派系：宗教的或称古典的保守派；基于文化传统的历史的保守派。同时，还应对保守派与文化民族主义做出区分，后者是提倡积极发展现代化的。施耐德教授进一步提出，近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始终处于边缘性地位，到1940年代为止对进步的批判基本有四种不同类型。在全球面临各种危机的今天，保守主义不能有效应对危机，但通常可以解释危机。任何理论都一定会带有它来源地的特色，现代性这个概念也不例外，具有很明显的西方色彩，然而它已传播至全球范围内，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的是考察该理论在哪些方面对全球各国均具有价值，应尽量放宽学术视野，跨区域、跨学科、平等地开展学术研究。

讲座结束后，施耐德教授与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第二讲：全球史与新的多中心方法：世界网络体系中的欧洲、亚洲和美洲

4月19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马龙（Manuel Perez Garcia）在北外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全球史与新的多中心方法：世界网络体系中的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学术报告。马龙副教授在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 University Institute）获得博士学位，曾在中国、意大利、美国、日



本等多地留学或访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历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跨国与比较历史、东亚与中国历史等。讲座由历史学院杨钊博士主持。

马龙副教授展示了他所主持的项目（GECM）的一项成果，即《全球史与新的多中心方法：世界网络体系中的欧洲、亚洲和美洲》（*Global History and New Polycentric Approaches: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ns in a World Network System*）一书的主要内容。马龙副教授指出，该书的目的在于进行“去中心化”，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采取新的叙述方式，将重点从过去的地中海国家和英国转移到过去的“边缘地区”在世界历史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到来的是对于新的国家历史叙述的要求，人们开始将目光放到东亚、东南亚和美洲。

在史学研究中有许多著作试图解决所谓的

“重大问题”(big question),如“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国家和中、日、印等国发展曲线之间的断层是如何产生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美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在中国讨论热烈的“李约瑟难题”:为何中国的科技领跑千余年,但是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却在欧洲率先产生了?马龙副教授认为,前人研究侧重于大洲之间的联动,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微观层面的研究,例如不同社会集团的消费水平等,而这正是本书试图填补的学术空白。马龙副教授希望通过特定的微观案例研究和微观层面的对比研究,从个案入手,观察过去不同社会的消费水平和行为变化,从而确定一个社会的繁荣与否。这种微观指标较之GDP之类的总体指标更能体现出社会中的群体有多少财富,从而可以更加客观地评判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

马龙副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所确立的对象和采用的指标,包括不同货物,如瓷器、丝绸以及银币等在中、日、欧之间的贸易和传播,以及葡萄牙商人在明朝与不同群体的交互和融合等等。马龙副教授还详细介绍了他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资料,包括亚欧美各国的多语言材料、翔实的数据,还有各种资料整合和分析工具,展示了其强大的研究能力。

演讲结束后,杨钊博士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这场精彩的讲座中,马龙副教授明确地指出了进行全球史研究所需要的方式和能力:首先是多语言能力,进行全球史研究必须要能够处理多语种材料,而北外作为全国开设语种最多的学校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次是活跃的组织能力,马龙副教授的合作伙伴包括中、日、英、美等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而他在其中则扮演了活跃的组织者的角色,这对研

究的成功进行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最后,马龙副教授具有多国留学、访学的经历,本身便是一个非常全球化的学者。这些对今天的中国学者进行全球史研究都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最后,马龙副教授与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互动。

第三讲:关于清末民初中小学科学教科书的研究

4月26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王扬宗教授在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关于清末民初中小学科学教科书的研究”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王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最初与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接触的经历。1995年王教授在上海辞书库工作期间,用于放置闲置图书的仓库要被腾出对外出租。王教授在阅读藏于仓库中的资料后建议将其保留下来,同时也告知了当时国内外对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感兴趣的同行前来查阅资料。这几年来,随着国内外对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的兴起,关于这一课题的书籍、论文与科研项目也逐渐增加。最近的成果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和201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百年中小学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重大项目等。

讲座主要从新学制与教科书、名词术语与科学语言以及教科书与科学传播三个方面展开。首先,王教授指出从近代科学史的角度考察,教科书的传播是整个近代科学形成以来非常重要的科学传播途径。从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中国实行新的教育考试制度,到现在已有110年的历史,从此科学教育成为基础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30年代,科学教科



书的内容与形式逐渐确定了下来。生于 19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普遍经历了“学习的转折”，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翁文灏、蒋介石、竺可桢等。在 1903 年到 1904 年期间，他们的学习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进入新式学堂学习。随着清末民初教育革命的开展，新的教育制度得以推行，各地新式学堂纷纷涌现，科学被纳入了新学制的各种教育之中。但是真正的高等教育到五四运动之后才得以形成。20 世纪初期中学教科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各行其是”，主要来源有中国留学生的编译、学部审定、教育部审定以及出版社之间的竞争等。1905 年以后，清政府成立了学部，后来民国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教育部。任何人或机构都可以参与编写教科书，但要经教育部审定后才可以出版发行。中国新教科书的印刷发行促使当时的出版社采取了新式的印刷技术与排版方式，也使得新教科书中的科学语言进入中国。

其次，王教授谈到，中国留学生在将国外

的科学教科书译介进中国时，大量的外语词汇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科学舶来词汇对汉语科学语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翻译名词术语与规范科学语言的过程中，墨海书馆等传教士机构、江南制造局、益智书会、博医会、科学名词审查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以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不同时期都担负起了构建汉语科学语言的责任。

最后，王教授说明了教科书与科学传播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教科书的传播是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清末民初中小学的教科书与近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念（包括科学真理观、科学的本质、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等等）的产生关系密切。基于科学教科书的本土化问题和对教科书与全球化关系的思考，王教授提出了“科学是否已经成为了当代科举？”和“如何改造当代学术语言融入全球学术创新？”的两个问题引人深思。

第四讲：教学与研究——19 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生、教授和科学

5 月 2 日下午，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医学博士、哲学博士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在北大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教学与研究——19 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生、教授和科学”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李雪涛教授介绍了近代世界大学起源于德国普鲁士的三所大学，分别是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以及现在波兰的费罗茨瓦夫大学，并介绍了腊碧士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医学社会史，健康、医学以及社会转型，公共健康和医院事业的社会史。



腊碧士教授首先对“实用性精英人才”作了简要介绍，这些实用性人才经过专业化训练，具有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和技能，能满足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和机构的需求。在中国汉朝就有类似这样的机构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与此同时在欧洲也有这样的人才培训中心。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深受古希腊博雅教育的“七艺”（liberal arts）影响，即天文学、几何学、算术、语法学、修辞学、雄辩术和音乐，在那时人们认为一名社会成员只有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有效履行他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大学是一个由老师和学习者共同组成的小型社区，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对课程和研究目标以及授予公认的学位都可以自行定义和实施。欧洲的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其传统结构及在世界各地获得的科学成就使它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

腊碧士教授讲解了欧洲大学诞生的自由与矛盾精神，大学和城市是欧洲文化的特质，指

出有体系的轴心时代要求人们清楚自己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因而人必须有意识地在三组思想中定位自己，即与他们自己和他们同胞的关系（社会理论、国家理论、人文学、伦理学）、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哲学、自然科学）、以及关于这些思想体系最终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联系起来（信仰、宗教）。世俗规则必须接受城市的开放空间和自由公民身份，宗教世界则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发现通往大学的世俗真理之自由。文艺复兴之后，世俗化发展出了社会和国家法律关于个人的人权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思想，这种思想没有假说，只有真理本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和大学都是从相同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因而在自由精神中它们是一对“姐妹花”。

腊碧士教授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大学改革为例，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理念。洪堡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性、为纯真理服务、以形成自由人格为目标，并列举了约翰·缪勒（Johannes Müller）、约翰·卢卡斯·舍恩来因（Johann Lucas Schönlein）、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三人的科学研究成就。

腊碧士教授提出了对当今大学的展望。大学给思想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机会，人才只有在优质且开放的教学空间中才能发展，因此目标是必须让老师和学生在当下的研究情景中接触。从历史上看，这是19世纪后半叶德国大学知识“爆炸”的关键，思想只有在无目的的研究空间中才能发展，研究中的新思想是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同样，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教学研究特别是学习研究中的新人才才能展示并证明他们自己，新思想和新人才都是自我引导的重要过程。事实上，新

思想和新人才能够通过自己得到发展，这种自主的状态和自主的教学研究过程是使一个大学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大学一定要为那些没有符合外部标准，或者不需要外部标准来衡量他们出色成就的人提供空间。换言之，孤独的思想家和孤单的古典实验者必须在大学里拥有自己的位置。

最后，腊碧士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提问一一作了解答。

第五讲：晚明与 17 世纪危机

5 月 16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室副主任陈时龙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晚明与 17 世纪危机”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北外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姚胜副教授主持。

陈副研究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思想文化史，著有《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再版），译著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明代的国家与社会》（黄山书社，2009 年）。

陈副研究员就“何谓 17 世纪危机”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他指出“17 世纪危机”是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界的一个流行概念。这一概念由霍布斯鲍姆在 1954 年发表的《17 世纪危机》（载《过去与现在》）中正式提出，并在 1965 年出版的论文集《1560—1660 年的欧洲危机》中得以强调，不过当时研究者们运用此概念时主要着眼于欧洲。随后学者将它应用于全球史的研究，例如杰弗利·帕克、莱斯利·史密斯在 1978 年主编的《17 世纪普遍性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但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界质疑的声音，一位研究拜占廷历史的专家认为真正重要的普遍性危机不是在 17 世纪，而在 14 世纪。主编《欧洲经济史》的意大



利经济史家卡洛·M·奇波拉也认为即便就欧洲社会而言，对 17 世纪过于突出其危机有违历史事实，使对 16 和 17 两个世纪的描述形成巨大反差。

陈副研究员指出近年来“17 世纪危机”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应用于对于明朝灭亡的历史分析。将“17 世纪危机”应用于中国研究，始于阿谢德 1973 年发表的《17 世纪中国的普遍性危机》，而魏斐德在 1985 年也发表了《中国与 17 世纪危机》一文。这一理论适用于中国预设的前提是，17 世纪的中国受到了气候和疾病相关的全球普遍性现象的影响，而且也与此时正在形成中的大西洋世界经济体系有间接的经济上的联系。持此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明代“17 世纪危机”的表现有人口减少、政治动荡、瘟疫以及白银流通的减少。同样，学界对此也有反对的声音。持相反观点的学者的依据是中国在 17 世纪 30 年代贸易依旧强劲，贸易的减少是在 17 世纪 40 年代出现的。而且

清初实行禁海政策，白银的流入受到限制，但是经济在清初得到复苏，17世纪的危机似乎轻松地得以度过。因此，陈副研究员认为仅将晚明的困境归于“17世纪危机”是不合适的，晚明的困境要回溯到历史中去解答。

陈副研究员阐述了导致明代崩溃的政治原因和军事及财政危机。他进一步指出晚明的政治困境是导致明代崩溃的根本原因。晚明的政治困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循而不作为”，指的是皇帝怠政和内阁大学士之无担当；二是党同伐异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倒张居正的政治风波和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三是君臣关系的紧张与解体，这主要是由于崇祯皇帝的个性导致的。另外，军事及财政危机加速了明朝的灭亡。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改变了明朝的命运，明朝大军遭到后金军队的重创，此战使得晚明“疲天下以奉一隅”。崇祯年间的民变使朝廷处于攘外与安内之间摇摆不定，这使得晚明军费暴涨，进而加深了既有的财政危机。明朝的财政政策未能将帝国的资源调动集中于朝廷，明代朝廷甚至没有发行统一货币的财政政策，致使社会财富分散于民间，朝廷维持帝国运转的能力因此削弱。

最后，陈副研究员对以上内容进行了总结，即晚明困境的根本性矛盾在于僵化的皇位继承制度与一切事务均由皇帝独裁之间的矛盾。明代在17世纪遭遇的危机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体制的僵化、经济的衰退、军事的溃败与财政危机、思想的倒退。政治上的僵化与思想上的保守主义使中国在应对危机时未能产生新的文化与政治机制，而军事上的溃败与财政危机却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最后，陈副研究员与在场的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第六讲：莎士比亚与17世纪的英国思想

5月23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经典与解释》辑刊主编姜林做了题为“莎士比亚与17世纪的英国思想”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北外历史学院讲师董成龙主持。

姜林老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典研究和西方经典研究，其专著《必歌九德——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释义》（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年7月）获2012年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天骕”学术奖，主要译著有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合译）、汉密尔顿的《幽暗的诱惑：品达、晦涩和古典传统》、郝岚《政治哲学的悖论》（合译，校对）、朗佩特《尼采的教诲：〈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解释一种》。

姜林老师概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地位及意义，他认为莎士比亚与17世纪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某种迟来的转向。“莎士比亚是所有英语世界的教师”，研读莎剧可以提升和教育读者了解关于人生或者政治生活的基本品质，核心是人之为人的教育，即“人是政治动物”的教育。莎士比亚所处的年代正是16到17世纪的转折期间，因此“激情”是贯穿其作品始终的思想，而在其所有剧本中，《李尔王》的意义最为重大，“自然”一词出现的频率最高，剧中新旧两种自然观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姜林老师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霍布斯的理想进行了对比，使听众对17世纪的思想有一个总体上的感受。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借埃德蒙之口清晰地传达出新时代的自然哲学以及由之而来的政治主张，而这一点，不但是剧中的剧情冲突，更是一种西方思想史上的思想冲突。莎士比亚戏剧的本质就是政治，而且尤为关心什么是最佳政治，笔下核心关注



是王者问题，或谓统治问题。尼采认为莎士比亚是“道德家”，在一个去道德化的新世界里，莎士比亚依旧坚持道德在政治世界中的意义，尼采尤其强调莎士比亚关注的一个要点：“激情”，但他并不谈论激情本身，而是在戏剧中呈现各种拥有激情的人。而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自然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自然权利学说，都植根于对人的激情的理解，激情——人的激情——是现代政治思想由之出发的理论开端。

娄林老师着重以“高纳里尔的‘利维坦’式新政治教育”以及“埃德蒙的新自然——‘利维坦’式的哲学教育根基”为例，细致地说明了莎士比亚呈现出的一种与霍布斯的政治构想本质上比较接近的政治类型。

莎士比亚批判了马基雅维利基于“激情”的政治自由和为达到自由采取的所谓“现实主义”，认为这种“利维坦”新政应该为更有德性的政制所取代，莎士比亚笔下的“利维坦”新政，更接近以柏拉图的古典视野衡量政治世界，这是与霍布斯不同的。霍布斯的自然哲学不再主张“宇宙由神的理智主宰”，但他汲取了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教诲，认为政治生活应该确立新的

道德原则，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法。霍布斯的自然权利的基础首先是他的自然哲学，并通过这种自然哲学发现人完全植根于自身的自然，这样的人的组合就是国家，而《李尔王》也呈现了两种自然观，柏拉图式的和霍布斯式的。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以埃德蒙、康华尔、高纳里尔和里根等人的戏剧行为展现了霍布斯以理论形式在《利维坦》中呈现的内容：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终结了“利维坦”式的思想和政治统治，让人们思考哲人的德性问题才是首要问题，并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重新认识自然的本性，而不能根据埃德蒙和霍布斯这样的自然来预设；二是次一级的政治解决方案，即继承人的问题。

讲座最后，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与娄林老师展开了讨论。

第七讲：20世纪50年代中国“亚洲史”的兴起：一个全球史的视野

5月25日下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陈怀宇在北外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做了题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亚洲史’的兴起：一个全球史的视野”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陈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宗教史与思想史、丝绸之路文化史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著在中文和英文世界都颇具影响力。

陈教授指出，中国的历史学科发展在经历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开始模仿当时苏联的历史学科建设模式，北大历史系因此划分为中国史与外国史，其中外国史包括欧美史与亚洲史。亚洲史这一专业是由在哈佛学成归国的历史学家周一良（1913—2001）先生主持设立的。周一良先生首设的“亚洲史”传承自晚清以来的



亚洲各国史研究。在1903年的《奏定译学馆章程》中即有外国文、专门学和普通学的研究分类，并提供教授中国历史、亚洲各国史和西洋史的课程。1911年罗师扬（1866—1931）在两广方言学堂中亦教授亚洲各国历史的课程，历史学家朱杰勤（1913—1990）最初也使用“亚洲各国史”这一名称。因此中国学者多使用“亚洲各国史”，但西方学者则大多使用“东方史”这一名称，后来名称逐渐统一为“亚洲史”。

20世纪50年代，为了响应中国领导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大陆高等教育历史学学位授予中设立了“亚洲史”的研究生学位。1956年，大陆高校的历史学家周一良、丁则良（1915—1957）、季羨林（1911—2009）、夏应元（1929—）等学者开会讨论并最终确定了亚洲史的课程设置与培养方案。1956年确定的亚洲史专业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南亚、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文化，西亚各国的历史文化在

后来逐渐得到了补充，当时所使用的教科书与课程设置参考了苏联的东方研究与苏联编写的百科全书。随着我国学者自主编写的亚洲史教材的完成，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亚洲史教学逐渐脱离了苏联教材的影响。我国学者编写的专业书籍有1957年王辑五编写的《亚洲各国史纲要》、1958年朱杰勤编写的《亚洲各国史》、1958年何肇发（1921—2001）编写的《亚洲各国史讲义》和同年周一良编写的《亚洲各国古代史》。

同时期亚洲史这一学科在日本、美国和苏联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日本的亚洲史研究始于其早期的“东洋史”的研究基础；美国的亚洲史研究是呼应二战后美国认识了解亚洲各国的需求的成果；苏联的亚洲史研究则更多地带有与中国争夺领导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意图而兴起。由于二战结束前亚洲各国多处于被殖民或半殖民的状态，因此以方豪（1910—1980）、朱杰勤为代表的研究亚洲各国史的亚洲学者先于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就提出了对西方东方主义的批判。总而言之，亚洲史的设立既响应了国家战略需求，也改变了历史学科的专业分类。这一学科在国际学术中的发展体现出世界各国对二战后日渐崛起的亚洲的反应。现当代中国亚洲史的发展既不是苏联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从专业设置到人才培养都是非常本土化的。

最后，陈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

第八讲：新视角下的21世纪中德关系

5月31日下午，现任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克劳斯·拉瑞斯（Klaus Larres）做了题为“新视角下的21世纪



中德关系”的学术报告。拉瑞斯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当代美国、欧洲与中国、东南亚关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20世纪国际史。讲座由北外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拉瑞斯教授回顾了中德双方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德国对中国的关注自两国建交起便与日俱增。中德两国间的经贸往来规模十分可观，双方政治层面上的互动与高层间互访也在增多。这样的实际互动使得一些声音认为中德之间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在习近平主席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时，两国即确立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中国不仅重视发展与德国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寻求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及欧盟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欧洲人士的担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都在积极寻求加强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与美国较之多边关系都更乐于与其他国家

发展双边关系。欧盟方面不能忽视的一点还有现如今中美之间与日俱增的矛盾，这将使得欧盟国家与中美任何一方之间的关系都受到影响。中国与德国在国际出口市场上是一种共享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德国是非常依赖外部经济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两国都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在走下坡路，这也意味着社会与政治局势将趋于不稳。尽管表示接受德国的建议，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与非洲等事务上的参与程度并未达到德国的预期。德国在对华关系上与美国相比，德国运用更为适应中国国情的政策，这是由德国不同于美国的可追溯至冷战时期的外交文化传统决定的。欧洲所面临的难民等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中国带来冲击，却也增强了“中国模式”的可信度。继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社会期待新的货币体系的出现，中国如今有可能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领袖国家。战后各国际组织的成立为世界人民的福祉带来了巨大影响。在结论部分，拉瑞斯教授认为中德关系间的不确定性、南海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透明性等等问题是当前中德关系中值得关注思考的内容。在讲座的全过程中，拉瑞斯教授列举了大量具体数据与事例用以阐述观点，讲座信息量大而丰富。

最后，拉瑞斯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

第九讲：遗产、法律与宗教——一项关于印度历史建筑保护的殖民史

6月5日下午，现任伦敦德国历史研究所印度中心负责人英德拉·森古普塔（Indra Sengupta）女士做了题为“遗产、法律与宗教——一项关于印度历史建筑保护的殖民史”的学术报告。森古普塔的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殖民地时



期的印度。讲座由北外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是森古普塔女士第一次在中国发表演讲，她出生于印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德国和英国任教，在这样的治学背景下的成长为她开展本项研究带来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森古普塔女士首先探讨了 20 世纪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法律如何对“遗产”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法国大革命后，人们通过法律和技术保护古老的历史建筑和构造。她梳理了由殖民统治与殖民法律衍生的国家、社群及历史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她指出，影响印度宗教建筑的一系列特定问题往往可以成为研究殖民时代印度历史和遗产观念的重要线索。在类似印度的这种殖民化社会中，遗产的概念和实践受到了殖民主义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经验的双重影响，因此

采取了多种多样形式，且更为复杂的途径进行遗产保护。最后，她探讨了通过国家的干预和立法来保护印度历史建筑的殖民国家政策与现有社会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

最后，森古普塔女士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

第十讲：韩中诗人在抗战华文诗歌中所表现的纽带与互动——兼谈韩华文学

6月8日下午，韩国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朴宰雨（Park Jae Woo）教授在北外图书馆三层报告厅做了题为“韩中诗人在抗战华文诗歌中所表现的纽带与互动——兼谈韩华文学”的学术报告。朴宰雨教授毕业于韩国首尔大学中文系，获得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韩国文学翻译院理事、国际鲁迅研究会会长等职。朴宰雨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韩中两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以及两国文学交流等。讲座由北外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朴宰雨教授带领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学习了几句简单的韩语，使现场气氛瞬间变得活跃起来。朴教授提出了这次讲座的相关问题意识，并从最近几年的韩中两国诗歌交流谈起。到目前为止，共有六届韩中诗歌朗诵会得以举办，诸多国内诗人，如北岛、舒婷、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和余光中等人均获邀参加。同时，朴宰雨教授主编并出版的《中国当代 12 诗人代表诗选》（韩文版），身体力行地为韩中两国诗歌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朴教授认为韩中两国诗人们所创作的华文抗战诗歌能够成为韩中两国联合抗战的铁证。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40 年代初，当时发行的几种华文杂志确认了韩中两国诗人们所创作的众多有关抗日主题的华文诗歌确实存



在。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这些诗歌弥足珍贵，它们可以说是韩国与中国互相合作、互相勉励进行联合抗日斗争的铁证。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挖掘与整理，朴教授详细分析了韩国华文诗歌的四个来源：传统华侨的华文文学，代表人物有韩晟昊、许庚寅和衣健美等；日本吞并韩国后流亡中国且从事抗日独立斗争志士的华文文学，代表人物有金山和柳树人等；留华韩国文人的华文文学，代表人物有许世旭、金惠俊等；韩中建交后定居韩国的华人或者朝鲜族新移民的华文文学，代表人物有金英明和奇英等。继而，朴教授又分析了从1931年开始抗战诗歌研究所经历的四个时期，并指出抗战诗歌研究中所遗漏的一个重要部分，即韩国抗日独立战争阵营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中文期刊《朝鲜义勇队通讯》、《韩国青年》及《光复》（纯汉文本）等杂志所载韩国人和中国人创作的华文抗战诗歌。

朴教授重点介绍了《朝鲜义勇队通讯》、《韩国青年》及《光复》等杂志所登载的抗战华文诗歌。《朝鲜义勇队通讯》登载13首诗歌（韩国7首，中国6首），《韩国青年》登载8首诗歌（韩国3首，中国5首），《光复》登载4首诗歌（韩国2首，中国2首），并展示众多珍贵的文献资料。朴教授指出：在三个杂志所登载的25首诗歌中，有12首是韩国人写的（其中2首是韩国人写后中国人翻译的），剩下的13首是中国人写的。进而，他指出区别这些诗人们的四条标准。朴教授认为这些中韩独立运动家们所创作的抗战诗歌，内容都很感人。虽然他们不是专业诗人，并且在创作诗歌的艺术性方面有一定欠缺，但是这些诗歌的创作对抗战却起着巨大的鼓舞作用。朴教授进一步指出：上述三个杂志所载的华文抗战诗歌主要表现了韩国人消灭敌人、追求韩国独立的意愿，描写了抗战时期韩国诗人们在中国流浪的苦难，赞美了中国人的抗日精神，也表达了诗人们对日本敌人的憎恶、怀念祖国山河的情怀。因此，这些诗歌深刻展现了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比如，中国诗人们所写的13首诗歌大都与鼓励韩国人、声援韩国人和中韩携手联合抗日斗争等内容有关。同时，韩国诗人们也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鼓励中国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等。此外，朴教授还饶有兴致地现场示范如何教韩国学生利用韩国歌曲《飞了飞了，飞机》的曲调背诵中国王朝历史，并教授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哼唱该曲调，又一次带动了讲座的现场气氛。

最后，朴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互动。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革命与爱情： 萨尔都戏剧在中国（1907—1946）¹

马晓东 /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

论文以法国剧作家萨尔都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改编情况（1907—1946）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中国话剧界对萨尔都作品认识与定位的变化轨迹，其次通过对萨尔都两部剧作——《托斯卡》和《祖国》在中国的改编与上演进行研究，探讨中国现代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文学中“革命与爱情”的主题对异国作品接受的影响，最后尝试以萨尔都在中国的译介与改编这一个案，讨论中国话剧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宣传、商业压力与艺术追求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

萨尔都 李健吾 《祖国》《托斯卡》 戏剧改编

¹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从新剧到抗战剧：萨尔都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改编（1909—1949）”的研究成果。

作为著名的佳构剧作家，萨尔都 (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 在 19 世纪末的法国剧坛曾风靡一时，其作品还超越了国界，影响了欧洲、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戏剧创作¹，甚至在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回响。尚在萨尔都生前，1907 年《神州日报》上就刊登了根据其作品《祖国》(Patrie, 1869) 改译的同名小说²，1909 年，留日的中国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则上演了由《托斯卡》(La Tosca, 1887) 改编而来的《热泪》一剧。至此，无论在出版物中还是在舞台上，萨尔都作品都开启了在汉语世界的传播之旅。其后，剧人们更是反复地翻译、改编和上演萨尔都剧作，其中包括春柳社、民鸣社、戏剧协社、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等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些知名戏剧团体。在中国现代话剧诞生发展的几十年间，这位今天已被遗忘的剧作家之名却不断浮现³。因此，对萨尔都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改编进行梳理，探讨其中所呈现出的特征与问题，或可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中国话剧的特殊选择与发展路向。

作为著名的佳构剧作家，萨尔都 (Victorien Sardou, 1831—1908) 在 19 世纪末的法国剧坛曾风靡一时，其作品还超越了国界，影响了欧洲、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戏剧创作，甚至在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回响。

一、从世界名剧到佳构剧 (Pièce bien faite)

萨尔都的名字与盛行于 19 世纪的佳构剧体裁密不可分。他在前辈作家斯克列布 (Augustin-Eugène Scribe, 1791—1861) 的基础上把这一戏剧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并因此成为当时法国戏剧舞台上最受欢迎的作家。随着中国早期话剧文明戏的诞生与发展，萨尔都的《祖国》和《托斯卡》这两部剧作先后经由日译本被译为中文，并被搬上舞台，成为 1910—1920 年间多家文明戏剧团的上演剧目。

1910 年，陈冷血从日译本翻译萨尔都《祖国》一剧，刊登于《小说时报》时将其标为“世界三大悲剧之一”；无独有偶，一年后的《小说时报》增刊上发表了天笑、卓杲合译的另一部法国戏剧《怨》(Adrienne Lecouvreur, 1849)，亦转译自日文，同样标为“三大悲剧之一”，其作者正是萨尔都的前辈、前文提及的佳构剧作家斯克列布。中国译者对萨尔都的这一定位，固然可能与来自日本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此时接触西方戏剧，是处于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虽然对个别作品感受至深，但对西方戏剧的发展脉络则完全模糊。以萨尔都本人的戏剧论，在彼时的上演广告中，完全不见这位原作者的名字，而观众也无从知晓“泰西三大名剧”⁴《热血》的作者与“世界三大悲剧之一”《祖国》的作者实为一人。更有意思的是，1916 年(《小说大观》，第 7 集)由徐卓杲根据歌剧本《托斯卡》翻译的《热泪》将作者标为“萨特”(实际上已更接近于原文发音)，但如果我们将其与冷血译《祖国》的作者“柴尔时”

1 可参阅以下文章: Ignacio Ramos Gay, *Victorien Sardou et la régénération du théâtre anglais* (《萨尔都与英国戏剧的再生》), 见 *Victorien Sardou, un siècle plus tard*, textes réunis par Guy Ducrey, Strasbourg,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2007, pp.227-243; Jean-Marc Leveratto, *La réception du théâtre de Sardou aux États-Unis* (《萨尔都戏剧在美国的接受》), Alexandre Tchepourov, *Sardou sur la scène du Théâtre Alexandrinsky de Saint-Petersbourg* (《圣彼得堡亚历山大德琳娜剧院的舞台上的萨尔都》), 后两文见 *Victorien Sardou: Le théâtre et les arts*, Sous la direction de Isabelle Moindrot, Rennes: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0, pp.357-369 和 pp.371-378。

2 法国文豪沙尔治原著，孤行译：《祖国》，连载于《神州日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二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3 萨尔都死后，这位剧作家的名字也逐渐被遗忘，他的剧作在舞台上的演出也极为寥落(演出稍多的是他和 Émile Moreau 合作的戏剧 *Madame Sans-gêne*，中译本为《无忌夫人》)。只是在近几年来，法国学术界才开始有一些专家关注 19 世纪后期一些在舞台上相当成功的剧作家。在法国先后有两本专论萨尔都的论文集出版，分别为上注所引用的 *Victorien Sardou, un siècle plus tard* (《萨尔都：一个世纪之后》，2007) 以及 *Victorien Sardou: Le théâtre et les arts* (《萨尔都：戏剧和艺术》，2010)，而前者则成为萨尔都去世后法国出版的第一部专论萨尔都的书籍。

4 《申报》1915 年 6 月 5 日，春柳社演出《热血》广告。

并置，这同一个作家的两个译名实让人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

直到抗战前后，中国剧人才开始直接从法文翻译和改编萨尔都作品。最早译自法文的萨尔都剧作是1936年陈绵为中国旅行剧团翻译的《祖国》，可惜由于这一版本并未出版，今已不存。现存最早一部从法文直接翻译的《祖国》是1939年由江文新翻译的，此剧由上海国民书店出版后，又在1941和1945年再版。而李健吾则在1944年从法文本改编了萨尔都的四部作品，其中由《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在上海沦陷区上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随着中国文艺界对西方戏剧认识的扩展，对萨尔都剧作的认识和评价也悄然发生了改变。1932年戏剧协社上演由《祖国》改编而来的《血花》，获得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前世纪的精制剧（well made play），虽然崇拜英雄的色彩太浓些，与现代平民化的剧本当然不能一律看待。但是全剧的结构却非常精妙。整个的剧本，好像是一部精细的机器，一发牵动，关系全局。这是现代剧本万万及不到的佳构。”¹将所谓的“佳构剧”（well-made play）与现代平民化的剧本，也即现实主义戏剧相比而突出其情节结构特

中国剧人对萨尔都剧作认识与评价的变化既反映出他们对西方戏剧面貌认识的深化，也反映出中国话剧自身发展的轨迹。

色，说明当时的戏剧协社同仁已经对西方戏剧发展的脉络有了大致的了解。不过，无论是《血花》的编剧汪优游，还是导演陈大悲，都是从早期文明剧团进入戏剧界的，他们对西方文学的熟悉程度与后来的学院派剧作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他们眼中，情节技巧的精细已足以成为佳构剧值得赞美的理由。

而在后来的萨尔都改编者马彦祥与李健吾笔下，对萨尔都“佳构剧”的局限则有了更多批评。在马彦祥由陈冷血《祖国》译本改编的《古城的怒吼》一剧序言中，他认为萨尔都“用机巧的故事来娱乐我们。他的故事的内容也许是很空洞的，做作的，但它们都精妙”，并批评《祖国》“因为过于看重了情节，便忽视了人物的个性，使得各个人物的行为完全受了情节的支配，这是这戏的最大的缺点（其

实也正是一般闹剧 melodrame 的通病）”。²

江文新译介的《祖国》之前有一篇《祖国作者萨度评述》（隐霞所作），文章也将萨尔都作品归于“pièce bien faite”（佳构剧），在介绍了这位法国剧作家的创作特色和主要作品后，作者提出，“从严肃坚实的理想出发，避免他那种以性格迁就情节的 melodrame 式的夸张，学取他那种紧凑的编排与剧场的悟性，是我们对萨度作品应有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写剧时应有的态度”。³李健吾则在为萨尔都剧作所写的“跋”中反思道：“向他学戏是一种危险，他的假货色多于他的真货色，他的技巧超过他的材料，他的戏巧于他的人生，他的紧张往往只是舞台熟练的结果。”⁴

中国剧人对萨尔都剧作认识与评价的变化既反映出他们对西方戏剧面貌认识的深化，也反映出中国话剧自身发展的轨迹。在中国话剧的草创时期，新剧和传统戏曲相比没有唱念做打等表演艺术的吸引力，往往借助于曲折的情节与紧张的戏剧冲突吸引观众。发表于1915年《游戏杂志》上的《啸虹轩剧话》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大抵观新剧者，既无歌曲可听，则专以情节为尚。”⁵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

1 《申报》1932年8月20日。

2 马彦祥编：《古城的怒吼》，武汉：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

3 江文新译：《祖国》，上海：上海国民书店，第9页。

4 萨尔都作，李健吾译：《喜相逢》跋，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

5 冯叔鸾：《啸虹轩剧话》，载《游戏杂志》1915年第18期。

里，情节编排的巧妙成为评判一部剧作的重要标准。随着中国话剧的发展，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后对西方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戏剧潮流的引入和学习、对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推崇，戏剧界将更高的价值赋予人物内在性格、心理的刻画以及对人生的表现。前述几位译者对萨尔多都的批评也都是从性格刻画的虚弱和不符合生活真实的角度出发的。

话剧从对情节的依赖中逐步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现代话剧的发展路向之一，也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于中国话剧发展的历程。以中国现代话剧的代表作家曹禺而论，相比于其首部剧作《雷雨》，他后来创作的作品《日出》、《北京人》就更少情节剧式的剧情曲折与巧合，而加强了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把握、心理刻画以及对现实的文化思索，曹禺曾说：“我想脱开了 la pièce bien faite 一类戏所笼罩的范围，试探一次新路，哪怕仅仅一次呢。于是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¹

如果说曹禺的告白表明了他自觉脱离佳构剧模式的努力，那么值得询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现代剧人对萨尔多都这位“佳构剧”代表作家有着持久的兴趣，甚至在译者和改编者越来越



多地反思和批评他的剧作时，这种兴趣也从未消失？

二、革命与爱情

若深入思索，春柳社和文明戏对萨尔多都的选取，除萨尔多都戏剧情节的紧张刺激外，还与当时中国剧人对西方话剧情感强度的发现、关注和模仿有关。正如袁国兴所言：“人们在话剧中抓到一点可以演出来的‘戏’，朦胧中感受到了西方话剧的情调，并尝试着把它表现出来的，便是这一‘情’字。”² 萨尔多都的很多戏剧“脱胎于黑色浪漫主义(romantisme noir)的母题和主题，汇合了恐惧，疯狂和强烈的激情与罪

行”，³再加上其跌宕奇巧的戏剧结构，萨尔多都剧作确实非常有“戏”。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生创作剧本超过70部⁴，但在中国只译介了6部，而反复的译介与演出，却绝对集中于两部作品——《祖国》和《托斯卡》。因此，单纯的情节曲折和情感强烈还不足以解释萨尔多都戏剧在中国的接受，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察《托斯卡》和《祖国》被改编者和剧人诠释的轨迹，才能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上面的问题。

这两部作品都将情节置于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祖国》描写16世纪时布鲁塞尔的贵族组织民众对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男主人里索尔伯爵

1 曹禺：《日出》跋，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2 袁国兴：《早期话剧与西方浪漫派戏剧的影响》，见田本相、董健主编《中国话剧研究》第3期，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3 Pascal Jouan, *Sardou et le mélodrame romantique, Victorien Sardou: Le théâtre et les arts*, p.58.

4 据 *Victorien Sardou: un siècle plus tard* 一书后的数目统计，萨尔多都创作的戏剧62部，除此之外，尚有歌剧、抒情戏剧和抒情悲剧等音乐剧14部。

发现自己妻子的情人竟然是他领导的抵抗斗争的得力助手加洛后，为了大局抛开个人恩怨。但妻子却因害怕丈夫杀死情人暗暗向当局告密，致使斗争计划败露，全部抵抗者均被捕牺牲。只有加洛因伯爵妻子的求情而获救。伯爵临终前要求加洛追查和杀死告密者，为同伴复仇。加洛发现真相后，杀死了自己的情人——伯爵夫人，自己也自杀而亡。《托斯卡》的背景则是意大利罗马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之间的冲突。男主人公、画家卡瓦拉多西，拯救了一位从监狱逃亡的共和党革命者，女主人公托斯卡因吃醋而猜忌自己的爱人，误中了警察总监斯卡皮亚男爵的诡计，暴露了革命者。斯卡皮亚男爵以挽救画家性命为诱惑，要求托斯卡献身自己。托斯卡假意答应男爵，要求他释放爱人，又在情急和愤恨之中杀死了男爵。但此时却发现男爵欺骗了自己，她的爱人已被下令处死，托斯卡最终也自杀殉情。两部作品都将爱情故事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以政治的惊心动魄和爱情的缠绵悱恻同时冲击着读者的情感。我们固然可以以人类的“公性情”¹来解释这两部剧作在中国受到的关注，但如果



民族与个人、革命与爱情的复杂关系，则很难深入对这一接受现象的认识。

著名的现代戏剧家顾仲彝曾说“中国的戏剧运动随着革命的潮流而来”，²处于民族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剧人对萨

尔都原作的政治元素不仅异常敏感，而且还不断地改编、利用这些因素进行本土的政治表述。1909年，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由《托斯卡》改编的《热血》，将剧中的结尾进行了改造，让两个革命的男主人公在行刑前交谈，说“专制必定会倒，自由平等的世界一定会到来”。二人最后的台词“我们生前是朋友，死后还是朋友”博得了满场的彩声。³1915年，春柳社在上海公演《热血》时，将该剧定位为“法国革命剧”，并以“其中描写政府之横暴，爱情之波折，英雄儿女悲壮缠绵”为宣传打出广告，⁴强调了政治与爱情的双重主题。从辛亥革命前的打倒专制政权到辛亥革命后的描写政府之横暴，春柳社同仁也根据时代需求潜在地更新着他们的政治表述。

春柳社虽然在萨都剧作中加入了本土政治表达，但对萨都剧作的上演基本上都是在异国空间中呈现异国故事。而随着中国话剧的发展，特别是洪深的改编戏《少奶奶的扇子》大获成功，话剧运动意识到了本土化的重要性。萨都本土化的第一次改编——戏剧协社的《血花》就带有强烈的本土意识。

1929年，内因外患停顿将近一年的上海戏剧协社由应云卫和汪优游（仲贤）主持，重新运营。汪仲贤重新改编了萨都剧作《祖国》，这一次，他

1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云：“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正吻合了《祖国》和《托斯卡》这两部萨都剧作的主题，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2 顾仲彝：《戏剧协社的过去》，载《戏》1933年第5期。

3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自我演戏以来》，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73页。

4 《申报》1915年6月5日广告。

将剧情完全中国化，将其置于北伐战争的背景下，把原著中的西班牙统治者转化为辛亥后的军阀，将比利时民族英雄移植为北伐时期的革命者，并改戏题为《血花》。在1929年演出的消息中，剧社强调这是“描写革命与恋爱之一幕悲剧”。¹1932年，戏剧协社在上海重演此剧，则将其誉为“一尊攻恋爱与肉欲问题的迫击炮”，“一部解剖革命与牺牲斗争的新贡献”。²

对政治和爱情双重主题的言说——这一既关系民族命运又涉及个人情感的戏剧框架，使萨尔都的两部剧作在抗战前后的民族危机背景中获得了较前期更为密集的译介、改编和演出。1936年，中国旅行剧团排演由陈绵翻译和导演的《祖国》，在上海、湖南等地巡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4月，量才剧团上演了由马彦祥根据《祖国》改编的《古城的怒吼》；同年5月，重庆怒吼剧社则上演了由林婧根据《祖国》改编的《血海怒潮》；1939年，上海剧艺社又在孤岛以洋装上演了江文新翻译的《祖国》，并连演多场；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上海的《月刊》杂志上又刊出了吴天、吴琛的改编本《祖国》。毫无疑问，萨尔都原作的标题及其刻画的爱国英雄与爱国精神满足了时代需要。更重要的是，剧

从《祖国》汉语翻译本与改编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特别清晰地看到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在“革命与爱情”这一主题上对原剧的变奏。

中所呈现的主人公恋爱与革命的冲突及最终以民族利益超越个人情爱的戏剧表现也特别契合抗战的需求。

萨尔都本人曾说，《祖国》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人，出于对祖国的爱，所能做的最大牺牲究竟是什么？”³ Pitricia Rondet 分析《祖国》在法国的歌剧改编版时认为，它所获得的成功正得益于萨尔都“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融合在一个广阔的场景中，把爱情与政治情节线索结合在一起”。⁴ 这一创作主题恰恰切合了抗战背景下的政治需求。在民族危亡的时代，个人服从于民族的主题不仅是很多个体的自我抉择，也成为政治动员的题中之意。

从《祖国》汉语翻译本与改编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特别清晰地看到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在“革命与爱情”这一主题上对原剧的变奏。三部改编

本《古城的怒吼》《血海怒潮》和吴天的《祖国》都将剧作置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把剧中比利时人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转换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如此，原作中为挽救情人而告密，并最终破坏了爱国行动计划的女子在改编本中就成了卖国的汉奸。如果说翻译本中的异国空间能够使中国观众对剧情认同的同时拉开一定距离，那么改编本则更直接表达了本土情绪。在陈冷血和江文新翻译的《祖国》中，都保留了原作中男主人公杀死告密的情人后自杀的情节。在这样的表现中，观众既理解男主人公因为爱国而必须完成英雄嘱托杀死奸细的举动，也对其爱的悲剧充满同情。可以说，萨尔都的原作虽然确认集体的革命任务高于个人情感，但亦向男主人的个人情爱表达了认可和敬意。可是在以上三部改编本中，改编者则都未允许男主人公在民族危难之时为爱牺牲，而是无一例外地让男主人公活下去，走上继续抗战的道路。⁵《古城的怒吼》以从远处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作结，召唤男主人公为国奋斗；《血海怒潮》则把“跳下窗子去‘成仁’的加罗（《祖国》的男主人公）改成了“跳下窗去掀起血海中的怒潮”的人物江滔（改编本中的人

1 《申报》1929年5月29日消息。

2 《申报》1932年8月20日广告。

3 Victorien Sardou, *Préface de La Haine, Théâtre complet III*, Paris : Albin Michel, 1934, p.10.

4 Patricia Rondet, *Patrie! de Sardou à Paladilhe, Victorien Sardou: Le théâtre et les arts*, pp.133—134.

5 可以参照的是，法国导演 Louis Daquin 执导的根据萨尔都《祖国》改编的同名电影，出品于1946年，向二战期间法国的抵抗运动致敬，其结局也未按照原著让男主人公自杀。

物)。¹为此，余上沅在剧评《怒吼出中国的新生》中也指出：“林婧女士的《血海怒潮》已不再是加罗的以‘成仁’为目的，而是江滔的求得胜利而再度奋斗。国家抗战已进入第二阶段，正是不仅要‘壮烈牺牲’，而且要击退敌人的时候，《血海怒潮》的上演，是有它特殊的意义的。”²

而在抗战胜利后出版的吴天、吴琛改编版，则将剧情安排在沦陷区，并在剧终时让一个男性配角向杀人后准备自首的男主人公发出“祖国需要你”的召唤，³最后二人一起离去，准备逃往大后方抗战。

另一部在抗战时期广泛上演的萨尔都戏剧则是前述春柳社最初改编过的《托斯卡》。在上海沦陷区，该剧由李健吾改编为《金小玉》，自1944年9月24日至12月17日，由著名的苦干剧团演出，黄佐临导演，在巴黎大戏院演出近三个月，一百余场，当时一片好评，成为沦陷区改编剧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⁴该剧在上海成功后，亦在天津、北平、重庆等多地上演，甚至在抗战胜利后也曾在上海重演。沦陷区高压的政治环境使改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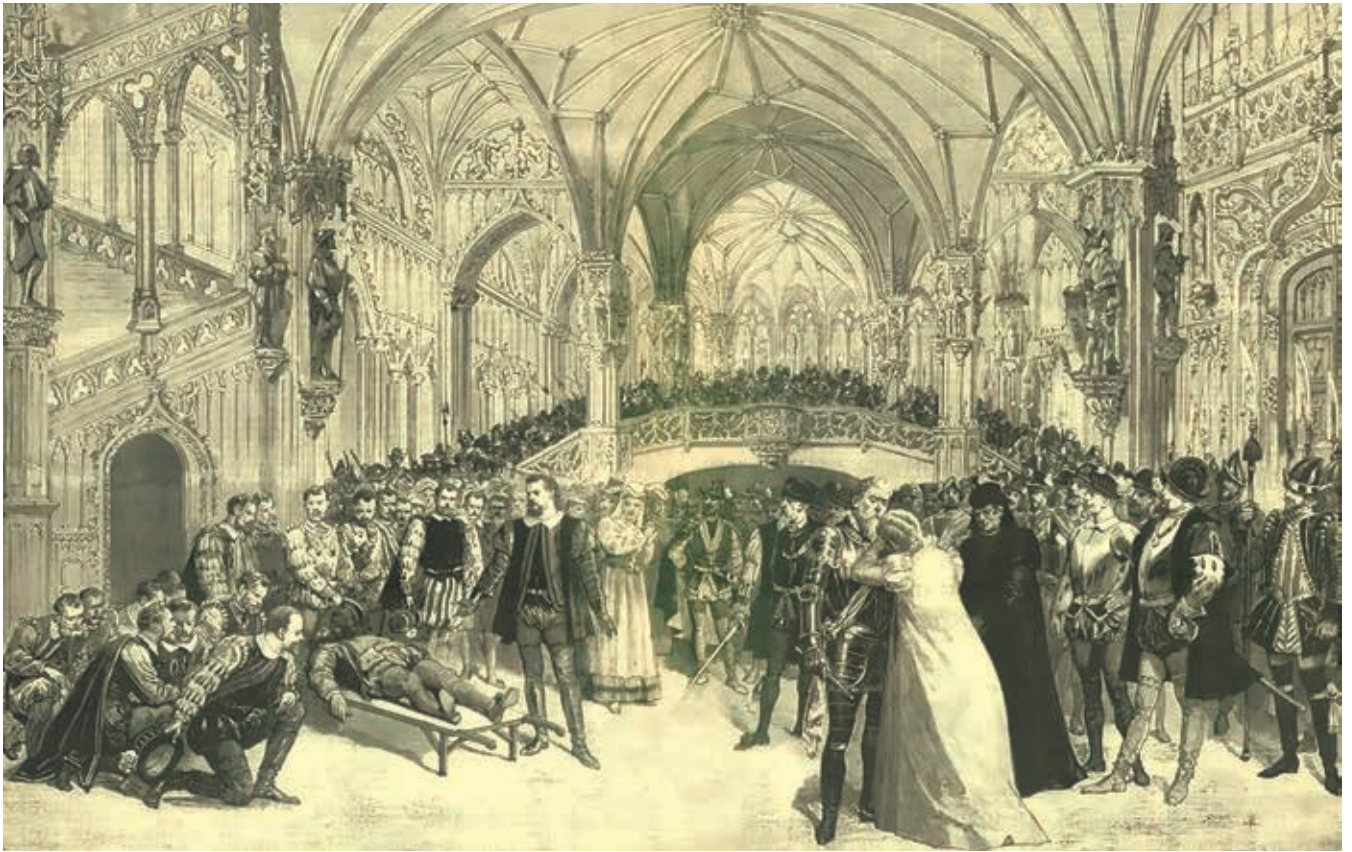
在沦陷的上海，这个人物在观众心中唤起的是对占领者的恐惧和仇恨，中国剧人在舞台上塑造总监形象时又特别增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暗示，将原作中托斯卡为爱情而杀死男爵的情节进行了强烈的舞台呈现，使在沦陷区长期被奴役的观众进行了情感宣泄。

和演出者无法如上述《祖国》的改编一样自由地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和表达，而只能进行隐晦的政治处理，其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词“壮士殉国、烈女殉情”通过传统话语将“革命与爱情”的表达进行了“历史化”。但观看此剧的沦陷区民众却对剧社的政治表达心领神会，完全能够体会其中的爱国召唤。《托斯卡》一剧中的斯卡比亚男爵被认为是“萨尔都塑造的最残暴的角色”，⁵在沦陷的上海，这个人物在观众心中唤起的是对占领者的恐惧和仇恨，中国剧人在舞台上塑造总监形象

时又特别增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暗示，将原作中托斯卡为爱情而杀死男爵的情节进行了强烈的舞台呈现，使在沦陷区长期被奴役的观众进行了情感宣泄。⁶著名剧评者麦耶富于深意地评论道：“《金小玉》决不是一部描写伶人的戏剧，而是一出革命的悲剧。”⁷在改编本中，李健吾让一个专注于考古的学者和一个本来心中只有爱情不问其他的女伶金小玉在捍卫自己爱情和尊严的过程中杀死了暴虐者，完成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作品中爱情的悲欢缠绵也因这一政治表达的注入具有了更崇高的色彩。

耐人寻味的是，1943年，著名翻译家与戏剧家李健吾改编了萨尔都另一部非常著名的悲情戏 *Fédora* (1882)，题为《喜相逢》，先后在上海和重庆上演，剧中也出现了和《祖国》相类似的男主人公为复仇不得不杀死爱人的纠结场面，然而与《祖国》、《托斯卡》相比，这出戏却反响甚少。在《喜相逢》中，男女主人公因误解和偶然陷入了悲剧，和《祖国》类似，最终男主人公为报仇而杀死了爱人。但他的复仇却是出于家仇而非国仇，这使

- 1 林婧：《改编〈血海怒潮〉的话——以原剧中的“力”推荐给中国观众》，申列荣、石曼主编：《戏剧的力量——重庆抗战戏剧评论选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 2 余上沅：《怒吼出中国的新生——希望于〈血海怒潮〉上演》，申列荣、石曼主编：《戏剧的力量——重庆抗战戏剧评论选集》，第34页。
- 3 法·萨度著，吴天、吴琛改编：《祖国》第六场，载《月刊》1946年第2卷第6期。
- 4 据邵迎建的研究，以票房计算，《金小玉》在沦陷区话剧剧中位列第5名。见邵迎建：《家破国碎思家国——1940年代的上海话剧与“五四”精神》，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17页。
- 5 *French Dramatists 1789-1914*, edited by Barbara T. Cooper, London: Gale Research, 1998, p.352.
- 6 马晓东：《商业化面孔下的政治呼唤——从〈托斯卡〉到〈金小玉〉》，载《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
- 7 麦耶：《观剧随谈》，载《杂志》1944年十月号。



他们的爱情悲剧只在个体层面上展开，不具备前述两部戏剧可以与本土政治话语对接的社会意义。

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的几十年间，在现代中国接受西方话剧的历史上，萨尔都这位法国“佳构剧”作家之所以不断吸引着剧人的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这两部剧作在主题上将爱情与革命（或者说爱情故事和政治表达）结合起来。而中国现代的革命与救亡形势、“革命与爱情”程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复出现为中国

剧人对萨尔都的作品进行本土化的言说提供了切实的可能。

三、商业、宣传与艺术

从萨尔都在中国的译介与演出来看，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一为文明戏时期，一为抗战时期。对文明戏时期的新剧从业者和观众而言，从西方传来的新剧不具备传统旧戏唱念做打等表演艺术的吸引力，因而，紧张离奇的情节和剧烈的情感冲突就成为赢得观众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价

值基础上，“佳构剧”作家萨尔都和克里布的剧作被誉为世界“三大悲剧”，也并非全无道理。

值得注意的倒是抗战时期，剧人们虽然都或多或少表达了对萨尔都剧作艺术价值的贬低，却屡屡求助于他的作品。上海沦陷区戏剧运动最活跃的剧作家之一李健吾直白地道出了他的考虑：“为了争取观众，为了情节容易吸纳观众，为了企图尝试萨尔都在剧院造成的营业记录。”¹实际上，同样从营业记录的角度考虑，在改编萨

1 萨尔都著，李健吾译：《喜相逢》跋，上海：世界书局，1944年。

尔都的四部戏剧之前，李健吾还改编了萨尔都的先行者、著名的法国佳构剧作家斯克里布的作品《云彩霞》（原作亦为 *Andrienne Lecouvreur*，与前文所述从日译本转译的“三大悲剧之一”《怨》为同一原作）。李健吾的选择代表了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艰难生存着的话剧人的处境。话剧给了他们在乱世的一个谋生之道，使他们能坚持自己的操守，不与敌人合作，而话剧提供的这种庇护又有赖于商业的维持。在这种境遇之下，熟悉法国文学的李健吾求助于在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剧作家萨尔都并非偶然。

而在大后方，抗战时期的话剧运动面临着突出的宣传任务，此时，对人类复杂处境和性格的深刻洞察往往必须让位于教谕的需要，萨尔都剧作善恶分明的戏剧冲突以及恶最终受到惩罚的清晰价值观特别适应于对广大观众进行政治动员的任务。尤其是《祖国》一剧，其所树立的祖国高于爱情的价值观在抗战时期得到众多翻译和改编者的青睐。在萨尔都剧作的改编本中，为了适应本土政治表达和宣传的需要，中国剧人往往强化了原作中的善恶对立，使改编本的价值导向更为鲜明。比如，在李健吾对《金小玉》的改编中，剧作家删除了金小玉杀死敌人后在他身上放上十字架的宗教慈悲（而这一情境，在19世纪的法国舞台上和后来著名歌唱家卡拉斯所演



绎的歌剧版本中，都曾获得极大的好评），考虑到这里的敌人指涉的是侵略者，李健吾的改编去除了对敌人的同情。马彦祥改编的《古城的怒吼》则让为爱情告密的女主人公进行了忏悔，而吴天、吴琛的改编则向男主人公发出了“祖国需要你”的召唤，把他从杀死爱人的痛悔中挽救出来。所有这些改编都是在明确的政治表达需求下产生的，而这些改编本往往汇入了人们笼统地称为“抗战剧”的作品。

归根结底，无论是出于商业考虑，还是宣传目的，在文明戏时期和抗战时期，话剧运动都面临着特殊的争取观众的任务，而萨尔都在舞台上创造的辉煌成绩无疑使其成为拿来的对象。不过，经历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洗礼，并对西方戏剧有了更深了解的新文学剧作家，又深刻地意识到萨尔都对观众的讨好和技巧的烂熟往往降低话剧

本身的艺术品格和表达深度，所以其译介就表现为一面批判，一面拿来的态度。现实的民族危机往往不允许艺术家们仅在象牙塔中追求艺术的进步，正如李健吾在抗战刚刚结束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我要艺术成为艺术，我同时更要它结实得犹如野地的大树，到了紧要关头，宁可牺牲美好，必须抓牢水土相宜的生命。”¹

不过，值得深思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间，中国话剧界对萨尔都的众多翻译和改编演出，除李健吾的《金小玉》外，在舞台上都未获得与萨尔都在本土的成功相匹配的成绩。悖论性的现象是，那些仅仅出于商业和宣传的考虑而被选择的异国作家作品却往往不能保证演出的商业与宣传效果。

在此，分析一下《金小玉》的成功，或可给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在《金

1 李健吾：《与友人书》，载《上海文化》1946年第1期。

小玉》之前，李健吾先后改编了斯克里的《云彩霞》、萨尔都的《喜相逢》、《花信风》以及《风流债》等佳构剧。《云彩霞》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先后在上海演出两次，但他翻译的一众萨尔都剧作，只有《金小玉》在上海连演百场以上，成为抗战时期的上海演出最成功的外国改编戏，其他几部则无甚反响。著名剧评人麦耶将李健吾的《金小玉》和《青春》评为1944年的剧坛魁首。他认为虽然是改编，《金小玉》却展现了李健吾“创作力的丰富”。¹ 麦耶认为这出戏的成功既得益于金小玉这个人物的塑造（李健吾的改编使其更为本土化了），也因为它所提供的革命悲剧的丰富。该剧并没有聚焦于“革命者”，而是通过一名学者、男主人公范永立和他的情人金小玉的悲惨遭遇体现了普通人对革命、对正义的担当。在沦陷区政治高压的环境下，职业剧人无法直接进行抗战宣传和鼓动，李健吾将剧作置于北伐时期，以范永立保护逃亡的“革命者”为情节线索，通过对正邪力量的刻画和普通人的道德选择，对身处乱世中的观众发出了维持个体道德操守的召唤。而对于无法直接抗战的沦陷区民众来说，对个体道德操守的坚持以及不向邪恶屈服的勇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特别是当金小玉杀死

考察萨尔都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状况，或许可以提示我们，萨尔都戏剧技巧的高超，他在本土对观众的吸引力并不能保证其作品在中国的成功，而其剧作的某些缺陷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在新语境中艺术价值的贬低。

.....
残忍的警备司令时，在沦陷区民众受蹂躏的政治环境中，作家在受压迫的观众心中所呼唤的正是一种刚烈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寓于一个本来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之身时，它尤其成为了对受蹂躏的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隐喻。在特殊语境下，李健吾从《托斯卡》挖掘出的内涵具有了在“此时此地”点石成金的效果。

在看似无法进行政治宣传的沦陷区，李健吾的改编本通过加强对人物的塑造和对白的琢磨，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既具政治召唤的力量，又有艺术水准的改编剧。相反，当李健吾将此剧进一步改编为《不夜天》，在重庆出版和上演之时，却成绩平平。在《不夜天》中，剧作直接改为抗战背景，警察总监也成为伪政府走狗，革命者莫同和范永立都是隐藏身份的抗日战

士。为了突出抗战胜利的希望，李健吾在结局没有让范永立死亡，而是让他获得拯救，逃往重庆。这不仅使剧作失去了萨尔都原作的悲剧力量，而且范永立的重庆地下党身份也使其失去了《金小玉》中呼唤普通民众道德操守的感染力。

可以说，《金小玉》在沦陷区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改编者的政治表达和艺术追求完美结合的产物，这也使它最终获得了观众与商业成功。而大后方对萨尔都《祖国》的改编，由于其直白的政治宣传和草创的艺术形式，² 却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更深入的政治动员的效果。

考察萨尔都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状况，或许可以提示我们，萨尔都戏剧技巧的高超，他在本土对观众的吸引力并不能保证其作品在中国的成功，而其剧作的某些缺陷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在新语境中艺术价值的贬低。文学是情境的艺术，而情境可以不断地被转喻和再生，它总蕴含着一些没有被某一个译本、某一种诠释说出来的东西。《金小玉》的成功在于它既遥遥呼应了异国剧作家政治与爱情的双重主题，又“落地”于沦陷区的此时此地，从原著的情境中汲取和创造，让原作说出了只有在“此时此地”才能够显现的东西。

1 麦耶：《观剧随谈》，载《杂志》1944年十月号。

2 马彦祥强调《古城的怒吼》“改编时间的仓促（当时是一面排一面写的），对话词句都未经修饰”（《古城的怒吼》序言）；而《血海怒潮》的改编者林婧也承认“在极短的时间内改编而成的《血海怒潮》，自己很知道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所可告慰的恐怕只是多少保留了原剧的精神而已。”导演陈治策也认为改编本中“还有很多西洋式的中国话”（《戏剧的力量》，第32页，第37页），这些都会影响到改编本的艺术效果。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6556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综合教学楼 1041 室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